



# 政府救济款发放不畅

■ 本报评论员：余凡

由于国内疫情于6月份节节攀升,经过专家组的反复研究、讨论后。总统于6月底宣布,决定自7月3日至20日在爪哇岛及巴厘岛各城市实行“民众活动紧急限制令”(PPKM)。此举是为了抑制新冠肺炎(Covid-19)再度爆发,并应对“德尔塔”(Delta)变异病毒快速蔓延。“PPKM紧急法令将严格限制民众在各种情况下的活动范围。”限制令将重点针对爪哇岛及巴厘岛被卫生部门评估为4级的48个县市,以及评估列为3级的74个县市。

限制令期间,在政府及治安单位的努力下,大多数民众都能遵守规定。但仍有一些反智、反科学的民众对疫苗及防疫措施存有疑虑,加上几个居心叵测的政客、公知不断发表煽动性的

言论,抹黑总统。看到被掀起的反政府浪潮,听到草根阶层在限制令下的谋生困境,很多评论都建议总统别再延长限制令,让民众稍缓一口气,不被谣言所蛊惑。

总统倾听民间诉求,在疫情仍未好转的现实情况下,权衡局势后于7月20日神色凝重地宣布:“紧急限制令”延长至7月25日止。不过,疫情稍轻的县市可以得到较大的活动空间,最重要的是,对“中小微企业”(UMKM)放宽限制,并尽快派发救助资金。

雅加达特区“原居民经营者协会”(HIPPI)沙尔曼(Sarman Simanjanong)称,政府应加快实施对“中小微企业”在限制令期间的援助,尤其是“小微企业”(UKM)恐怕很难坚持到7月下旬。“因此十分希望政府对受限制令影响的民众给予刺激性现金救助,让小微企业能渡过难关。”其中能

够尽快分发的应该是“小微企业救助金”(BPUM及BLTUMKM),政府已为今年第三季度拨款3.6兆(triliun)印尼盾,可以惠及120万小企业。

目前,小微企业面对重重困难,艰辛度日。“小微企业数目甚多,且对普通家庭及草根阶层的经济周转有贡献。希望‘资金补助’能准时下放到合格的救助对象。”沙尔曼认为,政府已经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让他们可以继续营业。“这对于小微企业来说无疑是温暖的和煦,他们无需为运营资金大伤脑筋了。”“祈愿社会民众遵守防疫规则及紧急限制令,以积极参与及奉公守法的互助精神,让这场风暴尽快过去。”

《罗盘网》于21日报道,财政部部长慕丽雅妮(Sri Mulyani Indrawati)在国家收支预算(APBN)会议后在记者会上重申,地方政府分发

救助金的行动十分缓慢。“乡村救助”(BLT Desa)总额28.8兆印尼盾,估计每位村民在一年内每个月能收到30万印尼盾的救助款。“已经分发的已有520万个家庭,其实,该笔救助款可以分发给800万个志愿者。”

部长表明,每个村庄实现分发的救助金高低不一,在163个县市的救助发送只达98.3亿盾,而救助款已筹备11.5兆盾,实际分发的只有上限的8.2%。“而在163县市中已获得救助金的仅有25547个村庄。”至今年7月,只有21个县市的2873个村庄,其“乡村救助”的发放率超过50%,从1.2兆的指标,已发放7176亿印尼盾,让人欣慰。

在达标的这21个县市中,中爪哇省有3个县市上榜,巴厘省有3个县市,南苏(Sulsul)有2个,东爪哇省1个,苏南(Sumsel)1个,

西加省(Kalbar)有1个,东努省(NTT)及西努省(NTB)各1个,连交通落后的巴布亚密米卡(Mimika)县也能顺利达标;反观接近中央、设施齐全的雅加达特区、西爪哇及万登省却无一上榜,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诸县市的表现也令人失望。可见地方政府在安排救助款分发及名单审核的工作效率起到关键作用。

“别忘了,如今已是7月份,救助款应该已分发至50%以上。然而仅有21县市能够按照指标分发达59.7%。”另外有99个县市达到分发指标的37.3%;有105个县市达到分发指标的21.7%。“我们正与内政部及乡村部(Kemendes)继续推动救助款能尽快分发。”

《罗盘网》报道,社会救助的每户60万盾“现款救济”(BLT)将于7月份重新对1000万受害者发放,详

细名单可以在社会部的公开网站 cekbansos.kemensos.go.id 查阅,受助者都是遭到新冠疫情冲击,甚至连每日基本需求都成问题的真正贫困的家庭。

中央政府经过社会部已向需要救助的贫困民众设置了“希望家庭”(PKH)、“粮食救助”(Sembako)、“现款救助”(BST)及其他形式的扶助政策。5月及6月的“现款救助”每人60万盾将由国家邮政局直接分发。而“希望家庭”的救助款将经过国营银行(Himbara)在各省市分发,而每个家庭所收到的救助款多少不一,视其家庭成员、状况而定。

地方政府发放救助款的行动缓慢,引发舆论猜测。万隆市于21日的请愿除“拒绝PPKM”外,还高喊“革命”。社媒上号召24日到总统府示威,这中间是否有着暧昧和瓜葛?

■ 巴厘：意如香

## 疫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马凯硕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是新加坡杰出的外交家,他的许多论述著作,立论观点公正客观,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推崇评价。最近他的一部著作《中国赢了吗?》,对中国现状与未来作了精辟的分析,得出结论:“疫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论点反响热烈,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热议,不失为一个深入了解中国前景实情的专家论述。

疫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一个科学论断,不管赞同与否,都必需给予重视分析评价。2020年的一场新冠大肆虐,重创了世界经济,颠覆了各国治理国家的能力,成为了判断各国体制实用与否的试金石,促成了2020年成为百年不遇的大变局。而在此一大变局中,严峻考验着各国应对治理国家的能力。

世人看到,在新冠大肆虐面前,绝大不分国家都应对失策,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抑制住疫情,反而让疫情大为失控,让确诊与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最为严重的竟然是号称先进国家的西方世界,尤其是超级强国的美国,至今仍然在疫情失控中苦苦挣扎,确诊高达3400万例,

死亡60万多,而且接种疫苗工作受阻,还不到总人口的50%,数十亿剂量疫苗被库存不用,使得疫情更加无法抑制。还连连引发社会动荡,枪杀不断死伤数万人,基建破损,楼房坍塌,加上洪灾、森林山火也越发严重肆虐,而白宫政客对国内的乱象无所作为,却大搞军事扩张,党争利益争吵不休,外交上企图转移矛盾甩锅中国与俄国。其结果美国内部灾难一发不可收拾,经济低迷,民怨沸腾。

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里,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巴西、印度、南非、印尼等等,都在疫情失控中吃尽苦头,经济低迷增速下滑,失业人口暴增,贫穷率上扬,南非还引发社会暴乱,疯抢商场,民怨命苦到极点。何处寻找平安方舟?难道就没有一处安乐土吗?

马凯硕教授经过认真评比分析,终于在世界乱象中看到一线希望,他把目光聚焦在东方古国的神州大地,疫情爆发至今两年来,唯有中国独占鳌头,一枝独秀。仅在三个月

内,就在2020年的四月份,基本抑制住了疫情,把疫情瘟疫控制在确诊八万多例,死亡不出6千人。而且成功研发了七款疫苗,至今已经接种了14亿7600多万剂量,几乎全国民众除了婴儿都接种疫苗。并给100多个国家供应疫苗,获得众多国家一直认可接种。请问又有哪一个国家做得到的呢?中国在疫情的控制上,大大优越于其他国家,又能无私伸手援助其他需要的国家,又有哪一个西方国家能有如此海量胸怀的呢?

而且中国经济抑制疫情后迅速复苏,复工复产,内循环加外循环,国内经济正增长达12.7%,全国呈现一片兴向荣的景象,更助力各国经济发展,一带一路成为引领世界经济成长的引擎,举世瞩目,是不可辩驳的中国正能量的凸显,所以马凯硕教授做出判断:“疫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完完全全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公正判断。

中国不但成功抑制了瘟疫疫情,还在应对洪涝灾害的肆虐中,向世人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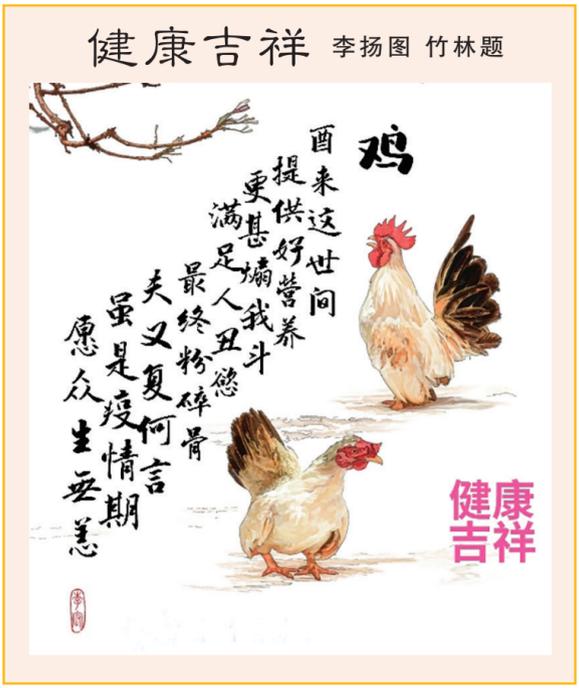
出了表率,中国一旦爆发洪涝灾害,都能全国一盘棋参加抢险,做到以最少损失控制灾情。例如最近的郑州大水患,郑州市大部分都遭受水淹,郑州地铁尤为严重,水淹地铁,车道受阻淹没在大水中,数千乘客水淹深过胸。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别国,被水淹乘客必然惊慌失措,纷纷夺命自相践踏逃命,其结果必然死伤过半,惨不忍睹。

但发生在郑州地铁的水患,数千水深裹胸的乘客却安然无恙,他们相信国家,都能自觉地等待救援,毫不慌乱,当救援队伍迅速赶到时,乘客们都自动让儿童、妇女、老人首先安全撤出,然后大家顺序一个接一个,疏散出地铁水患区域到安全地带,做到全体乘客安然无恙,地方民警干部还及时给乘客们供应食品饮料。如此有着高度自觉遵守纪律的国民,彰显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与民族自信心,与对国家领导的高度信任感。请问又有哪一个国家的公民能有如此高度自觉性的呢?

眼见为实,因此马凯

硕教授的结论:“疫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武断,而是中国确实实做出的优越表现,是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超人体现。马凯硕教授说:中国不会向外输出

“中国模式”,不会像前苏联那样“输出革命”,结果造成苏联解体的灾难性恶果。前车之鉴,中国承诺不会重蹈苏联后尘,中国尊重各国在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体制,不插手干预,中国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绝不做不利于世界人民的丑事来。针对这一点,马凯硕教授深信不疑。



郑丁春(中)和爪哇影片工业公司的员工

郑丁春(The Teng Chun)是公认的电影制作先行者,也是印尼电影行业赫赫有名的电影人物。

1902年6月19日,郑丁春出生在巴达维亚(Batavia)的一个富裕之家。郑父名叫郑金礼(The Kim Le),是一名做农贸生意的商人。郑丁春在巴达维亚的中华会馆学校(THHK)上小学。1920年,郑父送他去美国修读商贸专业。然而,他却去纽约的帕默尔剧院(Teater Palmer Play)学习如何创作电影剧本,并结识了同样来自印尼的土生华人杨中义(Fred Young)。1925年到1930年间,郑丁春一直待在上

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上海一直是华语电影制作的中心。郑丁春投身于电影事业,苦心孤诣地研究电影制作和电影行业。随后,他千方百计地说服郑父从农产品贸易改行从事中国电影进口。

1930年,郑丁春回到巴达维亚,计划成立一家电影公司,但郑父与他意见相左。郑父认为比起自己制作电影,还是继续做电影进口生意较好。尽管没有父亲的支持,郑丁春依然成立了希诺电影公司(Cino Motion Picture),执导了处女作《芝根邦的玫瑰》(Boenga Roos dari Tjikembang)(1931)。这部电影是印尼第一部有声电影。

## 郑丁春——电影制作先行者

■ 廖建裕(Leo Suryadinata)

该电影改编自知名土生华人作家郭德怀(Kwee Tek Hoay)的小说,讲述一个华人男青年和印尼土著少女的爱情故事。可惜的是,这部电影并未受到媒体的好评和观众的捧场。

郑丁春没有气馁。他改变策略,转为制作以中国民间故事为蓝本的电影,例如《山伯英台》(Sam Pek Eng Tay)(即《梁山伯与祝英台》)(1931)、《八美图》(Pat Bie Tu)(1932)、《八剑侠》(Delapan Djago Pedang)(1933)、《黑白蛇》(Ouw Phe Tjoa), (1934)等等,这些电影都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随后,郑丁春将电影公司更名为爪哇影业(Java Industrial Film),一鼓作气制作了多部以中国民间故事为背景的电影,如《五鼠闹东京》(Lima Siloeman Tikoes)(1935)、《黑白蛇2》(Ouw Phe Tjoa II)(1936)、《红莲寺》(Hong Lian Si)(1937)。起初,郑丁春包揽了影片制作各方面的工作。后来,他慢慢意识到分工的重要性,把工作分摊给了其他人。郑丁春

找来郑丁辉(The Teng Hoei)和郑丁亮(The Teng Liang)两兄弟帮忙。这两兄弟都受过专业训练,能熟练处理镜头和声音制作。有了专业人士的参与,郑丁春公司的影片质量越来越好。

然而,随着好莱坞电影大量涌入,印尼观众的观影口味开始发生变化。有关“泰山”(Tarzan)和“佐罗”(Zorro)的电影大受追捧,这迫使郑丁春不得不想方设法,重新制定电影方针。最后,他决心制作以本地为背景的动作片,邀请当地巡回戏剧团的演员如安查尔·阿斯马拉(Andjar Asamara)、拉登·伊斯玛伊(Raden Ismail)、陈清木(Tan Tjeng Bok)、杨菲非(Fifi Young)参演。这样的电影不少,其中有《被贩卖的少女》(Gadis jang Terdjoel)(1937)、《噢,母亲》(O Boe)(1938)、《草》(Alang-Alang)(1940)、《亚齐弯刀》(Rentjong Atjeh)(1940)、《丛林的女儿》(Poetri Rimba)(1941)。得益于郑丁春的不懈努力,爪哇影业成为印尼当时最

大、最现代的电影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尼电影业刚起步的阶段,电影行业由印欧混血儿和土生华人主导。此外,在联合制作的电影中,行业中惯常聘用华人和非华人工作人员。例如被誉为二战前最佳影片之一的《月圆》(Terang Boelan)(1937)就由一名华人(王氏)、一名土著萨艾伦(Saeroen)和一名欧洲人(巴林克,Balink)联合制作。尽管如此,直到1939年,荷属东印度仍只有两家电影公司。这种状况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有所变化。许多中国电影公司因战乱被迫向南搬迁,迁移地中包括了荷属东印度。因此,荷属东印度的电影公司数量在1940年迅速增长,当年就增至10家。与此同时,不同民族之间紧密合作的传统也得以延续。不断涌入的资金和日新月异的技术使得印尼电影业蓬勃发展,并取得长足进步。

日本对印尼的占领改变了印尼电影行业的势力版图。包括爪哇影业在内

的所有电影公司都被迫停止电影制作。二战结束后电影行业才有了复兴的势头。而郑丁春则在荷兰正式将主权移交印尼后才正式复出,重回电影制作的舞台。1950年,郑丁春与著名导演兼同事杨中义共同成立了一家电影公司,名为泗水之星影业(Bintang Surabaya)。该公司出品了许多电影,其中大部分取材于《一千零一夜》(1001 Malam)。令人惋惜的是,因1962年印尼电影行业深陷危机之中,这家电影公司也随之被迫关闭。为补贴生活,郑丁春开始教授英语。1967年,郑丁春更名为泰雅尔·艾德里斯(Tahyar Ederis,或更常称作伊特里斯,Idris)。

郑丁春对印尼电影行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雅加达特区政府的认可和赞赏。1976年,他获得了政府授予的荣誉证书。1977年2月26日,郑丁春在雅加达逝世。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